增长动力转换与高质量发展

刘秉镰　陈诗一 等

编者按:本文内容是根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湖南大学等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在经济所建所90周年国际研讨会2019年5月17日第四单元主题论坛"增长动力转换与高质量发展"上的发言编辑整理而成。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刘秉镰教授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陈诗一教授分别主持了两个时段的讨论。

郭庆旺(中国人民大学):"增长动力转换与高质量发展"在宏观经济理论上就是从需求管理到供给管理,从短期调控到长期发展,从规模扩张到效率提升。这样一个题目蕴含着在动力转换和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如何看待投资的问题。

第一,全要素增长率核算。理论上,在分析时应把理论基础的产出核算和统计中的增长核算区别开来。过去,大家在分析的时候把这两个内容弄混了。投资、出口、消费等是从产出核算的角度,也就是从凯恩斯国民收入决定的角度进行讨论的。其中,消费、投资、政府购买性支出加上净出口,这些都涉及投资。而讨论动力转换依据的则是增长核算体系,比如劳动力投入增长率、资本存量增长率、全要素增长率等。以全要素生产率为例,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并不低。1978—2013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是1.98,而同期日本是−0.14,韩国是1.46,美国是1.82。如果比较投资率非常高(资本存量的增长率非常高)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中国(1993—2013年)达到2.4,日本(1960—1982年)是1.99,韩国(1966—1996年)是1.75。总的来看,不管是改革开放初期,还是高增长时期,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都大大高于相应国家。

但需要进一步考量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方法。特别是在使用索洛余值测算全要素生产率时,需要深入挖掘一点,其中,劳动力增长的贡献不仅要考虑劳动力数量的增长,还要考量劳动时间的延长——加班。根据调查,加班可分成三类:其一是自愿加班;其二是被动加班,包括行政事业单位、企业要求加班;其三是主动加班,在农民劳动力集中的工厂,8小时能干完的活不干完,主动要求加班,为的是相对较高的加班费。由此可见,考量全要素生产率时不能太乐观,尽管比同期的美国、日本、韩国都高,但究其原因,过去粗放型的增长不一定在于投资、不一定在于其他投入,而在于劳动力的粗放利用。

第二,投资当中有三个事实要澄清。其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是经济停滞,而是经济增长缓慢。1987年,世界银行公布了划分标准,即年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3%。每年都增长3%,发达国家也不能实现。其二,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并不低。2017年,按2010年不变美元计价,中国人均资本形成额是3200美元,美国是13000美元,平均是14000美元左右,是中国的三四倍。其三,资本体现技术进步。因为,投资当中有很多是设备投资,设备体现了技术进步。但在目前我国的投资构成中,建筑安装成本2003年占60%,到2017年占70%,而技术体现比较集中的设备购置上的物质资本投资2003年占23%,现在占18%。因此,不能完全忽略了投资,但需要进一步调整投资结构。

林伯强(厦门大学):高质量发展与能源有较大的相关性,原因在于能源是基本的经济活动跟生活的基本投入,另外,能源跟环保、应对气候、雾霾治理都直接相关。

怎么解决中国能源结构问题？对比发达国家，方向是很明确的，就是在能源结构中降低煤炭占比。因为，没有雾霾、人均整体碳排放量比较小的地方通常都是以油、气和可再生能源为主要能源的。中国和印度是典型的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国家，煤炭占比接近 60%，因此，去掉煤炭这个目标是很明确的。问题的关键是怎么去？以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成本把它去掉。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每年大概消费 5 亿吨煤，现在则是 40 亿吨左右，因此，从能源消费数量来看，没有雾霾、没有环境污染是不可能的。但降低煤炭消费量很困难。很多人提出清洁煤的方案，把煤变成清洁的、零排放的能源，但超过国际标准追求零排放的做法是没有边际收益的。另外，即使解决了碳排放问题，但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的排放问题还是无法解决。所以，清洁煤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唯一的办法是减少煤炭消费。除了减少煤炭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之外，还要减少煤炭总量。

这两年煤炭大概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往下降，这样的成绩似乎得益于清洁能源的“大发展”。其实不是，这两年煤炭消费下降的贡献是来自于油气，而不是来自清洁能源。水电、风电、核电、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2016 年是 13.8%，2018 年还是 13.8%，尽管增长非常快，但比例没有变。由于涉及政策制定，特别是国际政策，需要对现阶段我国能源消费结构及其发展趋势有比较好的把握。2015 年 GDP 增长率是 6.9%，一次能源需求增长不到 1%，电力需求增长 1%；到 2018 年 GDP 增长率是 6.6%，电力需求增长超过 8%，2017 年也超过 8%，一次能源需求增长率超过 3%。为什么经过能源结构调整，更低的经济增长率导致更高的能源需求、更高的电力需求？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能源消费过于集中，64%的能源消费在钢铁、水泥等重工业，其中，重工业能源消费中 50%以上是电力。但重工业本身对 GDP 贡献与其在能源消费结构并不一致，所以在经济增长接近 7%时，能源消费增长只有 1%，电力消费增长也只有 1%，而现在经济增长 6.6%，能源消费增长却达到 8%。鉴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国家状况以及发展路径，通过降低或者抛弃重工业来解决能源消费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因此，对整个能源需求、电力需求不能过于乐观。整个能源结构中，水电的比重一直维持在 8.1%左右；油和天然气因对外依存过高也不能大幅度调整，前者为 70%，后者超过 40%；可以调整的是清洁能源，包括风电、核电、光伏等，但清洁能源占比过低，只占 5%左右，即使按照 20%的速度增长，也只贡献一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在能源需求很低的情况下，清洁能源可能替代煤炭，但如果中国的能源消费增长超过 2%，清洁能源的增长不能满足能源需求，煤炭消费就会增长。由此可见，能源消费或者环境问题与宏观经济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是密切相关的，单纯从能源角度是解决不了的。

张亚斌（湖南大学）：高质量发展应该涵盖三个内容：高效益、可持续、新动能。因此，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第一是增强企业的活力，第二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协同。关于增强企业活力，现在国家政策的重点是降成本，从降税降费方面想办法。政策里面有个很鲜明的、很有新意的提法是降交易费用、资源成本，同时降能源成本。但对企业经营情况做了一些调查，发现这些问题是比较难解决的。

第一，显性的成本不是很高，但是隐性成本非常高。比如，民营企业贷款两千万，利率 10%多一点，利息成本是两百多万，这是显性成本，并不算高。但除了利息，银行要求有两百万的金融服务费，还有两百万贷款要以资产而不是资金给企业。这个资产就是银行之前所收的那些资产，对企业来讲没有任何价值。对企业来讲实际成本是 600 多万元，而不是 200 多万元利息。

第二，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协同难度大。以政府补贴创新型企业为例，存在几个问题：一是，多头管理、重复申报、撒胡椒面。对创新的管理很多，既有中央、省、市、县（区）的纵向补贴，也有每个层级上不同部门的横向补贴，比如发改委、经信委等。但对企业来讲，申请补贴的成本很高，收益不是很高，而且要重复申报。二是，形成了一些严重依赖政府补贴的企业，没有补贴，这些企业就无法生存。三是，新技术完成中试前，难以获得市场融资，也难以得到政府补贴；而当企业能够得到市场融资的时候，政府补贴的资金也容易获得了。由此可见，政府补贴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发挥“雪中送炭”

的作用,也就不能为创新服务。怎样使政府这只有为的手跟有效的市场机制结合在一起呢?还是应该把政府的补贴进行聚焦,进行重新的创新。

第三,园区转型难。现在,每个地方都有各种各样的园区,但很多园区效益很差,要素的边际贡献率也很低。究竟怎么办?“腾笼换鸟”究竟怎么换?从调研结果看,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成功的经验是,政府通过战略引导、制定标准、制定规则,实现差异化的要素价格,使政府的力量和市场的杠杆作用产生叠加。

齐鹰飞(东北财经大学):从广义的口径看,2000 年以来,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一直在 20%以上,那么,财政支出究竟对经济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四万亿”投资为例,其中 1.8 万亿元用于“铁公基”和城乡电网的建设,也就是基础设施投资,用到科教文卫的是两千亿元。基础设施投资,大部分购买的是建筑业的产出,而科教文卫支出其实对应购买的是各个行业的产出。这么多的财政支出也确实拉动了建筑业增长。2008 年,建筑业的增加值为 1690 亿元,2009 年增加值为 2650 亿元,并且,通过整个产业网络拉动了相关行业(比如钢铁、水泥等)。很多学者认为,虽然四万亿投资帮助中国经济从金融危机里边快速的复苏,但同时也恶化了产业结构。这就意味着,在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是有权衡的。

现在中国的经济形势又不是很明朗,可能又会面临着财政扩张的压力,那么有没有办法在扩张的同时又让扩张的效果对那些限制发展的行业影响小一些呢?这样的政策优化有没有办法来实现呢?研究发现:(1)在技术进步满足规模不变的假设下,财政支出对 GDP 的影响仅仅取决于财政支出的总量,同财政支出的行业配置无关;(2)财政支出的行业配置确实会影响产业结构。这两个合在一起意味着财政支出可以把稳增长和调结构分成两步来进行,第一步从利润增长的角度确定财政支出的总量,第二步从调结构角度考虑支出的行业配置。

王军(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现阶段创新驱动和投资拉动存在一定程度的互补,而不是完全替代的关系。经济增长面临着动力转换,这是目前的一个共识,就是要由投资拉动转向由创新驱动。但当前,创新驱动还难以完全替代投资拉动。这是因为,在中国稳就业,就需要经济达到一定的增长率,如果经济增长率完全失速,就业压力就会变得非常大。依靠创新驱动,实现动能转换是未来经济增长的路径,但在某些短期政策选择上还是需要考虑进行一定的投资,以稳定经济增长。

创新的选择应当基于市场。本质上,经济增长需要一个制度创新的环境。这就需要进行基于市场化的改革,实现市场引导的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一定是符合企业发展、符合经济发展的。现在创新的方向、内容存在脱离或者偏离企业需要的问题。

另外,以创新驱动经济增长需要保护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度与力度跟经济增长存在 U 型关系。也就是说,产权保护强度的提高在短期内不利于经济增长,但长期来看,随着产权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强,创新越来越强,对增长的促进作用也越来越强。这同样存在一个策略优化的问题,即如何根据经济发展现实选择一个适当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既要让短期的阵痛来得轻一点,又能让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在更长期内得以实现。

徐现祥(中山大学):高质量发展或者增长动力转换最常见的是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切入,但增长是一定要落在企业层面的,或者说发展质量提高了,增长动力转换了,肯定要体现在微观的市场主体上。这就需要关注商事制度改革或者叫“放管服”改革。通过 2015—2018 年对 16 个省 84 个市 182 个区做的几轮调研,可以发现:

本轮商事制度改革的出发点是市场准入。以前不是普惠政策,小企业想进入市场,营业执照、各类许可比较烦琐,也就是市场准入难。进来之后变成准营难,最后是退出难。从市场主体反馈来看,尽管这三难还有,但都在发生变化。从调研看,这三难只占 10%,反映最多的是市场竞争激烈、成

本高。

通过这几年的“放管服”改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可能的原因有两个：其一，市场主体数量快速增长。按照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口径，2013 年“放管服”改革开始时市场主体数量是五千多万，现在的口径是 1.1 亿，尽管对 1.1 亿的数量有不同的看法，但数量的增加是客观事实。这就为中国的新增长动能的转换、发展质量的提升奠定了数量的基础。其二，第三产业市场主体数量快速增长。改革之前，第二产业市场主体数量占比大概不到 30%，第三产业大概是 70%，第一产业非常低；到 2018 年，第二产业占比变为 15%左右，而第三产业占比已经到了大概 80%。这一轮商事制度改革是围绕市场准入便利化的改革，但没有放开更多的市场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主体从五千多万增长到 1.1 亿，竞争自然就更激烈了，成本也就更高了。为此，短期内要继续推进市场准入改革，同时要加强监管。更重要的是要放开更多市场领域，让市场主体可以进入更多原来禁止进入的领域，从而为高质量发展奠定真正的坚实的市场基础。

蔡跃洲（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谈动力转换跟高质量发展，既要看到国内发展阶段到了目前这样一个水平需要动力转换，更要看到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和趋势，为动力转换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正是因为有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考虑动力变革和高质量发展就不能完全局限于以前的投资、消费的老框架。

高质量发展不是一个学术性的语汇，两点可以表征高质量发展的特征：一是全要素生产率，二是需求满足。中央文件中已经指出，动力变革、效率变革、质量变革，最后都要落脚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是从供给的角度，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高质量发展。从需求满足的角度看，“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所以需求能不能得到更好的满足也是高质量发展的衡量指标。

虽然对历次工业革命、产业革命有不同的划分，但如果按照熊彼特的创新经济学的长周期划分，如果 2008 年以后算一次的话，可以划分为 6 次，每一次基本上都是新的技术革命带来的主导技术和主导产业的更替接续。这个更替接续本身就是一个新的增长动力，就是一个动力转化的源泉，而且新的技术往往代表着更高的生产率水平，所以，技术革命首先从产业结构转换的角度带来了新的动力。

具体到这次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主导的核心技术就是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通俗一点就是“大、智、移、物、云”，这一技术有三个技术经济特征：第一个是渗透性。作为通用技术，能够渗透到其他技术的方方面面，跟每个环节、每个产业都能够结合。未来随着数字技术或者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不断向全社会渗透融合，贡献会越来越大。第二个是替代性。替代性是基于信息通信领域，尤其在硬件领域。从 1971 年第一款英特尔芯片开始，一直存在 18—24 个月价格降低一半的规律性现象。这样一个持续 40 多年的连续的价格下降，相当于经济学里的替代效应，无论是消费品还是资本品都会更多使用 ICT（信息通信技术）相关产品。从增长核算的角度来看，ICT 领域的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越来越大。第三个是协调性。这一特征是信息通信技术所特有的。因为，信息通信技术体现在 ICT 资本里面，不管是具体的数据信息还是产生数据信息的设备都会带来其他要素之间协调性的提高，带来其他要素协调性的提高就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提高，反映在企业层面就是利润的增加，反映在中观层面和宏观层面就是增加值增加和 GDP 的增加，额外增加的 GDP 就是高质量增长的新贡献。

通过对 18 个部门对数字经济的测算结果表明，从产业数字化的整体渗透率看，数字技术对 18 个部门的增加值的贡献占比只有 8%左右，大部分在 5%以下，但有两三个行业比例特别高，这说明未来产业数字化或者数字技术往传统产业渗透融合的空间非常大。从供给侧角度看，这是未来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着力的方向和重要的点。

回到消费层面，现在基于信息通信技术带来的新经济、新模式（如平台经济）更好地满足了人们

需求,很多长尾需求都得到了很好匹配。在微观经济学里,相当于消费者剩余极大限度地提高了,消费者剩余提高虽然现在很难核算,但不可否认消费者满足度更高就是一个高质量的发展和增长。

杨新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高质量发展面临着动力转换,包括消费和创新两个主要的驱动力量,如果联系经济发展过程,那就是从赶超经济体向成熟经济体的转换。从发展特征看,一个成熟的经济体一定不是靠投资拉动的,而是依靠内源性的消费驱动的经济体。

从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看,中国和欧盟、日本、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还有很大的差距。目前,中国的最终消费占 GDP 比重大概 55%左右,而欧盟、美国、日本都在 75%以上。另外,从宏观经济的三驾马车来看,消费在经济中的贡献逐渐回升,但这一回升是在经济下行过程中投资和出口下降的情况下出现的,如果结合经济增长率,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没有变化,长期在 4 个百分点左右。

之所以消费难以启动,最主要的原因是劳动收入占比在宏观分配格局中过低。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在 50%以下,而发达经济体一般都在 65%左右,因此,要提高劳动收入占比,进而提高消费支出,实现消费驱动。但近年来,中国居民的收入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基本持平(在 6%~7%),有时甚至会低于经济增长。这就意味着,宏观分配并没有向劳动一方倾斜。按照统计局五分组看居民收入增长可以发现,从 2015 年开始,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率快于其他收入阶层,特别是中间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率近年来是在逐渐下降的。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其他收入阶层,不利于消费的提高。因此,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对高质量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

问题的关键是经济在下行,政府不得不在居民收入和企业利润之间进行微妙平衡。维持增长和就业需要向企业让利,反映在政策上就是近年来的商事制度改革,大规模减税降费。但这些政策必然带来利润增长,从而使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快速增长。这不利于转向消费驱动的高质量发展。但如果不推出这些政策,企业生存困难,居民收入不能增长反而可能出现下降。既然企业利润不能下调,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又要提高,那么在宏观分配格局中就只能通过压缩政府税收了。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从 2013—2018 年中国总体税负水平从 68.8%下降到 64.9%,虽然一直在降但依然处于较高水平。同期的欧盟、日本、美国大概是在 45%左右,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还有很大政策空间。因此,政府在转换动力的过程当中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需要政府平衡这三者之间的总体的收入分配关系,既要给企业让利,也要给居民让利,既要实现创新驱动,也要实现消费驱动。

刘秉镰(南开大学):几位发言人从不同的角度就动力转换、高质量发展报告了研究成果。郭庆旺老师从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林伯强老师从能源消费结构,张亚斌老师通过案例讨论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关系,齐鹰飞老师研究了财政支出对 GDP 的影响。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角度看,强政府是一个典型特征,研究中国的动力转换问题,应该从政府做起。建国 70 年来,中央一直考虑的是党领导的政府要关注人民,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党的十九大,除了 1962 年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其余都是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群众需求的不满足的矛盾。虽然提法不太一样,但实质是一致的。问题是怎样解决?这就要通过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带来生产效率的提升。王军老师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研究了创新驱动和投资驱动的关系。徐现祥老师研究了“放管服”改革,确实存在不同。从区域经济发展情况,原来是东中西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现在主要是南北差距。原来国内发展最好的三大区域——沿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大湾区,现在看收缩到两个经济高地——珠三角和长三角。珠三角和长三角经济发展之所以快,主要是市场化程度高。这一点对研究动力转换,除了研究技术层面的问题,在管理体制方面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蔡跃洲老师从供给侧改革到社会需求满足两个视角研究了新技术的渗透性、替代性和协调性,对未来创新有很重要的启示。杨新铭老师比较深入地研究了收入分配如何反作用于经济增长的问题。其实,经济背后是政治,政治背后是文化,我国五千年的文化形成

了储蓄传统。中国储蓄率很高,还与消费者预期有关,这在研究中也需要考虑。

潘士远(浙江大学):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里面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即“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粗看这句话,好像高质量跟低速度是联系在一起的,而高速度跟低质量是联系在一起的。但实际上,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就是增长动能转变。如果动能不转变,有可能变成是低质量、低速度,也就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动能转换好了,有可能一方面有高质量,一方面又有高速度。

高质量发展,从企业方面看是效率要高,也就是成本要低或者利润要高。从个人看,就是日子要过得好一点,最简单的一个就是人均可支配人均收入要高一些。现在问题是可支配收入占 GDP 的比重与发达国家(占 60%~70%)相比,中国的低很多。

从全国来讲,高质量发展一是跟平衡发展有关,二是跟收入分配有关,三是跟环境问题有关。这就意味着,高质量发展需要从多个层次理解,从个人、企业、全国层面,即要把微观、宏观结合在一起理解。

回过头来讲增长动能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很好理解。但创新是系统性工程,取决于很多方面,要有跟高风险匹配的金融体系,要有更有利于增长动能转换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还要有人力资本积累,等等。

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基础研究。大家都知道中兴事件,芯片对中国发展制约很大。现在,学界和其他产业界都在讲“缺心少魂”,心就是芯片,魂就是软件、操作系统。整个学界都在反思,到底为什么?虽然有不同的说法,但有个共识就是中国在基础研究投入比较少。据统计,中国 R&D 投入占 GDP 的比重已经超过 2%,投入总量仅次于美国,处于世界第二。但是,如果把 R&D 分成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进一步看这个数据的结构,会发现 2014 年应用研究投入是基础研究投入的 20 多倍。尽管对基础研究存在低估,因为,大学里面很多都是基础研究,但即使加入这部分,应用研究投入/基础研究投入也超过十倍。而在美国这个比例是 4.67,在日本是 7.16,在德国是 3.84,也就是说,我国的基础研究投入是比较少的。

基础研究投入比较少,应用研究投入比较多,可能跟 GDP 锦标赛有关。因为,中国政府的动员能力很强,应用研究起效快,基础研究发挥作用慢,在 GDP 锦标赛下政府自然偏好对应用研究更多投入。但不管怎样,如果不能在基础研究方面进一步加强,增长动能可能做不到顺利转化。

史宇鹏(中央财经大学):高质量发展最根本的是要满足消费者的高质量需求,这跟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是连在一起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意味着人民群众的一些高层次的、高质量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因此,应该把这个作为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和落脚点。这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

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可以把人的需求从低到高分成几个方面,首先是生存的需要,在生存基础上是安全的需要,包括财产安全、人身安全,接下来是社会交往的需要,最后是尊重和自我实现。随着经济的发展,需要会更多的转向精神、文化等软性或者虚拟的产品,甚至一些传统的物质产品也需要赋予某种文化或者精神方面的含义才能够满足消费者消费升级的需要,而这可以作为推动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从物质产品、精神产品划分,高质量需求更多是对高质量服务包括文化教育等等精神产品的需求。高质量的服务可以分成两大部分:其一是公共服务的高质量,公共服务不仅包括行政部门提供的服务,也包括公共机构,比如公立医院、公立教育提供的服务。从现实情况来看,很多公共服务欠账并没有得到弥补,比如上学难、看病难。这些说明公共资源、公共服务提供不足,而且相对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差距是非常大的。因此,需要花大力气解决公共服务缺乏、公共服务质量不高的问题。

私人服务的高质量发展或者市场服务的高质量发展与公共服务的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不同。对于私人产品、私人服务来说,要重视发挥市场的作用,这就要求取消市场进入壁垒,建设竞争性市场,这是最基础的。后续的如产权保护等等,但首要的是消除竞争性障碍,因为市场竞争才是提高质量的最重要的外部的条件。

陈冬华(南京大学):增长动力的转换和高质量发展是作为一个宏观要求提出来的,但需要在微观基础上能够实现。微观基础有赖于公司治理的完善和提升,即高质量的公司治理。高质量的公司治理需要学术界在三个方面进一步的深化研究:

第一,怎么驱动创新建设高质量的公司治理。创新驱动在公司治理中的一个重点在于激励机制。激励机制上到底选择怎样的模式,是否要跟美国一样成为货币激励特别高的市场,还是像日本、欧洲那样,货币激励相对低的模式。是不是用了高激励的方案,就能够马上实现创新驱动?这些需要进一步研究。另外,中国的股权契约自由度比较低。在《公司法》修订上也在讨论股权契约的自由度低,但是不是彻底把这个交给股东、交给企业家更好一点?实际上,历史上我国演进出了所有权跟控制权的分离更为彻底的制度,比如山西票号在两百多年前的"生股"。

第二,高质量发展需要一个利益相关者共享的公司治理机制。利益相关者共享的公司治理机制,要求企业发展不仅仅关注个别大股东的发展,还要让每个人都实现利益的增长。从这个层面看,到底资本市场的发展重要、创新重要还是投资者利益更加重要?如何保护投资者利益?这些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回答。现在都在呼唤注册制,但注册制跟法治高度相关。在法治没有重大推进之前,推进注册制是否又回到了事实上审批制。而注册制做到最后可能还是无法保障投资者利益。

第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到底能支撑怎样的资本市场?虽然美国的资本市场令人羡慕,但这样的资本市场全世界只有美国一家。在设立资本市场目标时,要考虑我国公司治理的特点和哪些国家更加相似,这样的公司治理又能够支持怎样的资本市场。显然,这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

房宏琳(《学习与探索》编辑部):《学习与探索》是黑龙江省社科院主管主办的,也是历届的核心期刊,是全国百种重点期刊,得了两届百强社科期刊,也是首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在历年社科基金考核中都是最高等级,也得了专项资助。这几年,《学习与探索》以专栏形式对特定的热点问题组稿,比如这次"增长动力转换与高质量发展"就可以在经济学栏目下做专门讨论,可以单篇发,也可以做笔谈。和专业类期刊相比,综合性期刊的办刊模式更灵活一些。2019 年的重点选题围绕"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变革""构建中国学术语言话语体系""5·17 讲话"三周年等等。希望各位专家学者多支持《学习与探索》,多给《学习与探索》投稿。

李林木(广东财经大学):当前,创新在区域之间、企业之间严重不平衡。以江苏为例,其创新能力、创新水平在全国属于前列,但 2017 年苏南 5 个市里面研发经费投入 1262 亿元,苏中、苏北 8 个地级市(苏中 3 个,苏北 5 个地级市)研发经费投入合计 600 多亿元,前者是后者的 2 倍多。广东也是,粤东、粤西、粤北大部分地级市都是欠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在创新水平上没有差异。

另外,大型、中型跟小微企业之间的差别也非常突出。同样,以江苏为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近五万家,但是有研发活动的企业不到 40%,这意味着 60%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都没有搞研发活动。西部地区的企业,一是创新能力弱,二是创新动力不足。创新能力弱主要是因为投入不足,而创新动力不足主要原因在于专利保护不足,企业通过模仿受益降低了研发动力。

提高创新能力重点是要提高中小企业,尤其是欠发达地区中小企业的创新动力与能力。在公共政策上,现在财政补贴、转移支付、税收等都需要改进。从支持的环节看(创新可以分为创业投资、研究开发、成果转化、收益分配四个阶段),我国现在的税收优惠主要集中在收益分配环节,比如对高新技术企业企业所得税征收 15%的税率。但其他很多国家是把政府的资源放在缩减投资、创业投资和

研究开发等环节，还有适当的结构成果转化。

王伟同（东北财经大学）：近几年，东北问题非常热，其中有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东北的人口外流。从人口普查数据看，东北人口净流出两百万人。数字本身并不是太大，但是关键里面有个结构性问题，就是外流人口很大一部分都是高层次人才。根据流动人口监测数据，在所有省份的外流人口当中，本科以上学历占比最高的是辽宁省。2014 年，辽宁省外流人口当中本科占 18%，这在全国是最高的。吉林和黑龙江也很高，都在全国前列。由此可见，东北的人口外流和其他地区的人口外流是不一样的。高质量发展和未来增长动能转换，人力资本是非常重要的。到底什么原因导致人口外流？有经济原因、历史原因还有人口结构的原因等，但更重要的是东北比较特殊的制度原因。

作为老工业基地，东北有个特点，就是国有经济的比重高，整个社会的代际流动低，子承父业现象非常突出。直接看国有经济对人口迁移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因为，国有经济对人才有吸附能力。但如果以体制身份——就是父母在当地有没有体制身份，是不是处级以上干部等——来度量个人和体制的距离，就会发现国有经济比重比较高的地区，对具有体制身份的高学历人口有显著的且非常强的吸引力。相反，没有体制身份的高学历人口会有很强的外迁意愿。这就意味着国有经济体制按照体制身份来配置人力资本是有扭曲的。这是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进一步考察城市内部的代际流动水平对城市内部人外迁意愿的影响，发现城市的代际流动水平越高人们外迁意愿越低，相反，城市内部代际流动水平越低，人们外迁意愿越强烈。因此，一个城市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需要形成一个有利于个人成长、发展的能够留住人才的公平的制度环境。

张学勇（中央财经大学）：创新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够出现的，而驱动创新的重要力量就是完备的金融市场和资金的支持。当资金到了创新部门能够获得更高的回报时，这个部门就会有更多的资源随后而来，创新就会蓬勃发展。因此，一个良好的金融的体制对创新有很大的影响，进而影响高质量发展和增长动能转换。

伴随着经济发展，我国金融增长非常之快，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三大攻坚战”之一就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国家提出一个概念，就是大量的金融资源流向了虚拟经济而不是实体经济。现在，经济政策的目标之一是让金融资源服务实体经济，但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完全找到一个特别可靠的答案。

当前实体经济里面很多创新没有得到足够的金融支持，原因可能是过去的创新主要表现为商业模式创新，而不是技术创新。在互联网时代，商业模式创新确确实实获得了巨大发展，也可以看到其背后资本推动的力量。比如，美团估值两千多亿元，虽然不能说它对社会没有作用，但是占用的资本太大；再看共享单车，确实是很好的行业，但是技术含量不是那么高；还有网络游戏行业，一款游戏的收入超过很多上市公司的收入；现在网络医疗行业又获得资本追捧，但网络医疗也只是商业模式创新，真正需要大量资本投入的生物技术、前沿的比如治疗癌症的技术上面，却没有这么大的资本投入。

由此可见，过去的创新主要集中在商业模式上，真正技术创新却缺乏资本支持。这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怎么样通过政府政策来引导更多资本进入技术创新的领域。当然，国家有很多政策要求银行做很多事情，包括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互联网金融等。政府还可以通过财政补贴、利息补贴等等提高技术回报，进而引导资本进入技术创新领域。

另外，中国到底缺不缺这样的资金（资本）呢？其实，中国是不缺资金（资本）的，中国是全世界资产管理市场非常大的国家之一，高净值人群的财富在全世界排在前列。现实是，一方面技术创新缺少有效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高净值人群的大量财富缺乏有效的投资渠道，形成了中国财富的“堰塞湖”。在正式、正规、有效、合法的渠道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一旦市场上出现机会，这些财富就会通过非正常的渠道涌到相关领域，这几年爆发的 P2P 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大量居民的财富缺少正

规的投资的机会,P2P 给出 12%的投资回报甚至更高,财富就会流过去,导致很大的资金浪费、财富浪费。

解决“财富堰塞湖”关系到高质量发展。解决财富管理和技术创新是联系在一起的。当前,对于国家来说,金融体制改革应该打通核心关节,引导更多财富投入到技术创新领域,也就是怎么样在传统 VC 之外拓展更多的渠道。比如,提供一些公共产品,尤其借助金融科技(如数字金融)把居民的财富引向技术创新市场;也可以通过建立股权投资、债券投资等渠道化解“财富堰塞湖”,使资本更好服务技术创新,以促成增长动能转换和高质量发展。

严成樑(中央财经大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是 8%~9%,确实是一个奇迹。相比于韩国、新加坡等经济体创造的东亚奇迹,我国高速增长的持续时间更长,平均的增长率也更高。有大量文献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80%~90%的文献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主要是归于要素投入,尤其要归于资本投入、劳动力的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目前争议比较大。

虽然,中国经济增长很快,但背后的创新能力还比较薄弱。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2017 年全球创新指数的排名中国排在第 22 位;2016 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过全球竞争力指数,中国排在第 49 位。另外,根据佩恩表,如果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是 1,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 1978—2014 年都在 0.4 左右,不到 0.5。总体来说,中国相对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是平稳的,没有出现人均 GDP 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步提高。由此可见,我国的创新与前沿相比还有比较大的差距,创新能力严重不足。

就 R&D 投入来看,一方面是经费投入,另一方面是人员投入。根据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教育回报率估算的人力资本水平,中国相对于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也有很大差距。除了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更重要的是人力资本错配。目前,中国人力资本错配比较普遍,大量高素质人才没有投入到基础创新部门,而是进入垄断行业或者事业单位,这对创新的影响可能比较大。

创新不仅依赖投入,也依赖环境——创新的环境。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指数中与创新环境最相关的有三个指标:一是知识产权保护;二是高校和企业研发的合作;三是吸引人才能力。中国在这三个指标上的表现是,2015—2016 年知识产权保护在全世界的排名是 63 位,高校和企业 R&D 合作排在 32 位,吸引人才能力排在 27 位。从这三个指标看,中国在创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方面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改进。

综上,一方面是创新投入结构还需要进一步优化,加强基础研究投入。目前,基础研究投入的 98%来自政府投入。企业对基础研究投入的积极性非常小,基本上没有动力做这样的工作。而韩国、瑞士等国家,企业对基础研究投入能够占基础研究投入来源的 40%~50%。因此,如何通过一些合理的方式和方法激励企业投入基础研究是未来需要面对的问题。

人力资本方面,一是人力资本的数量,更重要的是人力资本的质量。因为,即使同样的教育年限,产生的人力资本的质量也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基础教育、高等教育都需要政府更多投入,包括在薪酬体系上的改革,把优秀的人才吸引到基础创新领域。

环境方面,除了知识产权保护,还需要探索如何实现学校和企业的优势互补。高等学校和一些科研机构在基础研究方面有优势,而企业在应用研究和技术转化方面有优势,如何实现二者之间的优势互补,是未来政策着力的重要方向。

陈诗一(复旦大学):下半场分论坛,潘士远教授提了一个问题,什么是高质量发展,围绕这个问题各位专家从不同的层次、不同的维度讲增长动能的转换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总体来讲,这里有几对问题需要比较。我们一直讲,经济增长是要素驱动,还是现在要求的创新驱动,或者是全要素生产率驱动。从要素增长来讲,传统增长方式靠投资或者大规模投入,现在从高质量的视角来讲,要构建

有效的资本市场，不是不加大投资，而是要精准投资，要投到需要的实体经济、投到小微企业。也就是说，要求更高了，投资要求也更高了。劳动力也是，以前是低端劳动密集型企业大量发展，但是现在从人力资本的驱动角度来讲，在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求肯定也是不同的。比如，上海金融中心建设，比香港、比其他金融中心一个最大的问题是金融人才的比例太少，上海只有 10%，其他金融中心是 30%～40%。建立金融中心肯定是高质量金融市场，但要有足够的人才。

再讲要素，原来是高耗能的，高耗能跟高污染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当然不能再延续以前的高耗能模式了。像中国煤炭的问题，把煤降下去好多问题就解决了，大气污染就没了，二氧化碳的排放也就没了。但是，煤不好减。煤的特点是又多又便宜，不仅中国用，日本、韩国用的都是中国的煤炭，原因就是成本低。因此，要减煤有一个问题，减煤会影响增长。能源驱动经济增长，就要用新的能源，但新能源、清洁能源成本高，难以发展。这里可能包括投融资就要有资金资助能源产业结构的演化，不能硬生生的去煤。

全要素生产率不是一个西方的用语，其实是很好的度量技术进步、效率提高的指标，也就是度量资源配置能力的很好的指标。传统一般以资本、劳动来研究全要素生产率，现在还要考虑能源的投入，甚至有时候还要考虑土地资源的投入。21 世纪前 10 年的增长，中国的事实是重化工业化回潮，土地工业化，房地产业高歌猛进，如果不考虑能源测算全要素生产率肯定是不全面的。如果把多要素考虑进去，要把 GDP 中有些负面的东西——如环境污染、金融风险、社会阶层分化等负产出——考虑到模型里面去，这样算下来全要素生产率会被压低很多。有些研究看到，中国已经进入了效益驱动和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阶段，但如果不全面考虑的话，结果会相差很远，所以要更全面考量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指标。

无论是要素驱动，还是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经济增长肯定是要的，没有增长很多问题就不能解决。包括“三大攻坚战”，除了系统性金融风险要防治，污染也要防治，还有精准扶贫都要在持续的增长中解决。所有的任务，高要求的、高质量的目标都叠加在一起，实现起来困难重重。因此，要在稳增长与其他的多维度目标（包括环境、收入创新等等）之间实现均衡发展。

（编辑整理：杨新铭）

（校对：何 伟）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